

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普列漢諾夫著

唯 眞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普列汉諾夫著

唯 眞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ОЛИ
ЛИЧНОСТИ В ИСТОРИИ

本书原据1941年俄文单行本译出，1949年曾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印成单行本。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时，曾将本书收入，并由译者根据上述《选集》俄文版作过一些订正。这次排印大十六开本时，译文曾由吴国英、张光瑞两同志据俄文版重新作了一次校订，增加了一些注释和人名索引。

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

〔俄〕普列汉諾夫著

唯 真 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56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4 $\frac{1}{4}$ • 字数 43,000

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1964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21 定价(五)0.40元

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¹

已故的卡勃利茨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写了《理性与情感是进步的因素》一文²。在該文中，作者援引斯宾塞的言論，硬說在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性只起着次要的并且完全是从属性的作用。有位“可敬的社会学家”³反駁卡勃利茨时，对这种輕視理性的理論表示了含有譏嘲意味的惊异。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为理性作辩护，当然是正确的。但他如果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出的那个問題的实质，而单只指明問題的这种提法本身如何不可以和不容許，那他就較正确得多了。事实上，“因素”論本身就是沒有根据的，因为它隨便挑出社会生活中的几个方面来，将它們看作独立的实体，变成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并以不同的功效引导社会人类走向进步的一种特殊力量。这个理論在卡勃利茨那里所具有的形式，尤其沒有根据，因为他不是把社会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識的不同的領域說成为社会学的特殊的实体。这真是絕頂的抽象；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再进一步就会走进显然妄誕无稽的滑稽可笑的境界。这才是“可敬的社会学家”應該叫卡勃利茨及其讀者們注意的地方。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发现卡勃利茨因极力探寻历史上

占統治地位的“因素”而走进了怎样一种抽象的迷宮时，也許会在无意中对因素論本身作出一点批評吧。而这在当时对于我們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但他却没有胜任。原来他自己也是站在这一理論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具有折衷主义的傾向，所以在在他看来，一切“因素”都同样重要。后来，在他攻击辯証唯物主义的言論中，他的头脑中的折衷主义本性更是表现得特別明显，竟以为辯証唯物主义是为了經濟“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學說。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連想都沒有想到辯証唯物主义和“因素”观是毫不相干的，所以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邏輯思維的人才会认为辯証唯物主义是替所謂无为主义⁴作辩护的。不过，應該指出，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的这种落空絲毫也不新奇：过去有，现在有，并且大概将来很长一个时期也还有許多的人会这样落空的……

当唯物主义者还没有制定出对自然和历史的辯証观的时候，早已就有人責备他們倾向于“无为主义”了。我們且不去追溯“往古”，只消提一提英國一位著名学者普利斯特列同普萊士进行的爭論⁵。普萊士在評論普利斯特列的學說时，硬說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能相容，硬說唯物主义取消了个人的任何独立性。当时普利斯特列曾援引日常經驗来回答过他。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誰也不能說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动最无生机的

(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 但我要問問你：你在哪里找得到比必然論的继承者更富于追求最主要目标的思考力、积极性、力量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人呢？”^①普利斯特列說這話时，是指宗教民主派，即指当时所謂 *christian necessarians* [必然主义者基督教派]^②而言。我們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該派的普利斯特列所认为的那样积极。但这点并不重要。毫无疑义，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与最坚毅的实际活动相容的。朗松說道，“所有一切向人类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說，都在原則上认定意志沒有力量，这些学說否认自由而使世界服从宿命論”^③。朗松以为凡属否认所謂意志自由的观点都会走到宿命論，这是不正确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看出一件极其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其实历史告訴我們，甚至宿命論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坚毅的实际行动，而且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論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基础。例如在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表现过更大的毅力⁷，又如穆罕默德信徒在

① 见《普萊士博士与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关于唯物主义學說和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討論》(«A Free Discussion of the Doctrines of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In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r. Price and Dr. Priestley»), 1778 年倫敦版第 391 頁。——校者注

② 十八世紀的法国人看見唯物主义与宗教信条这样結合起来，一定会深为惊讶。但在英國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这种现象奇怪。普利斯特列本人就是一个非常信奉宗教的人。真是各地有各地的风俗。

③ 参閱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俄譯本，第 1 卷，第 511 頁。

很短一个时期內就征服了从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若认为我們只要一确信一系列的事变必然到来，我們就失去了促进或阻挠这些事变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那就大錯特錯了^①。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鏈条中必要的一环。如果是的話，那我的犹豫就会更少，我的行动也就会更加坚决。这是毫不足怪的：当我们說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鏈条中必要的一环的时候，那也就是說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看来是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这种缺乏意志自由反映在他的意識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如他所作的那样去作。这便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站在这个地位上，也就不能不这样作”]来表示的一种心理，由于这种心理，人們就会表现出簡直不可遏止的毅力，作出絕

① 大家知道，依据加尔文学說，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上帝預定了的。Praedestinationem vocamur aeternum Dei decretum, quo apud se constitutum habuit, quid de unoquoque homine fieri valet. [“我們所謂的預定，是指上帝永久規定的、上帝对自己規定的、对各个人也发生效力的事情而言。”] (Institutio, lib. III, cap. 5. [《訓條》，第3冊，第5章])同时，依据这个學說，上帝从他的侍从中挑选出几个人去拯救遭受无理压迫的人民。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个摩西就是这样的人物②。从一切方面都可看出，克伦威尔也自认为是上帝的这种工具；他始終——并且大概是由于非常誠摯的信念——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意旨的产物。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行动都預先帶着必然性的色彩。但这不仅沒有妨碍他趋向于一胜再胜，并且还使他这种趋向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② 关于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傳說，詳見《旧約全書》《出埃及記》。——校者注

頂惊人的丰功伟业。哈姆雷特^①根本不懂得这种心理，所以他只能唉声叹气。因此，哈姆雷特也就始終不能容忍那认为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学。費希特說得对：“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二

我国有些人听信了什塔姆列尔的意见，以为西欧有一种社会政治学說似乎含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我們所指的就是他的关于月蝕的例証。其实这一例証是再无聊沒有了。在月蝕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在內并且也不可能包括在內。单就这点来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蝕的政党。然而，即使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中，那末，凡属很想看见月蝕而同时又确信月蝕这种现象不用他們促进也必然会发生的人，也是不会加入月蝕党的。在这种场合，他們的“无为主义”不过是拒絕那种无謂的即无益的行动，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为了使月蝕这个例証在我們所探討的场合不再是一种毫无意思的例証，上面提到的那个党就得把这个例証完全改变过来。那时就必须設想月亮是个有意識的东西，它受蝕时在天空中所占的位置是其意志自决的結果，而这个位置不仅使它感到极大的快乐，并且是使它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

^①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所作的同名剧本(1603年)中的主角，这个人物是内心充满矛盾、行动迟疑不决的典型。——校者注

絕對必需的，因此它總是力求占据這個位置^①。作了這一切設想以後，應當自問一下：當月亮終於發現原來並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決定它在天空中的運動，反而是它的運動決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的時候，它又會作何感想呢？照什塔姆列爾的意見說來，如果月亮不用某種邏輯的矛盾來解脫這種窘境，這種發現就必然使它不能運動了。但是這種假定是毫無根據的。誠然，這樣一種發現，也許會成為使月亮心情懊喪，使其精神失調，使其“理想”與機械的現實發生矛盾的一種正式根據。但是我們既已假定“月亮的精神狀態”歸根到底完全是由它的運動來決定，那末我們也就應當在它的運動中去探求那些使它精神失調的原因。如果我們細心加以觀察，那我們也許能看出，當月亮处在遠地點時，它是以其意志不自由為憾的，而當它处在近地點時⁸，它却又會覺得這是使它精神爽健的新的正式根據了。也許結果恰巧相反：也許它不是在近地點，而是在遠地點能找到使自由與必然互相融洽的辦法。但是無論如何，這樣互相融洽无疑是完全可能的；對必然性的認識是完全能同最堅毅的實際行動相容的。至少迄今歷史上的情形常是如此。

① «C'est com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pla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tourner indépendamment de quelque autre cause, 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s insensibles de la matière magnétique», Leibnitz, Théodicée, Lausanne MDCLX, p. 598. [“這恰好似磁針沒有發覺磁性的作用，向北方轉動，以為它是按自己的意志作的，根本不依任何原因为轉移，并以此而感到快樂一樣”。萊布尼茨：《神正論》，1760年洛桑版，第598頁。]

否认意志自由的人，往往比自己的所有同代人都有更坚强的意志，并且对于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例子是人所共知的。显然，什塔姆列尔是忘記了这种例子，只有故意不愿意看見历史现实真相的人，才会如什塔姆列尔那样忘記这种例子。例如，我国主观主义者⁹和德国某些庸人就是极不愿意看見历史现实真相的。但庸人和主观主义者并不是人，而是如別林斯基所說的一样，不过是些幻影罢了。

现在我們來仔細看看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过去的、现时的或将来的——行动完全带着必然性色彩的那种场合吧。我們已經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既如穆罕默德那样自认是替天行道的使者，或如拿破仑那样自认是不可逃避的天运所选定的人物，或如十九世紀的某些社会活动家那样自认是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的人物，那他就会表现出几乎是自发的意志力量，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在他的道路上所筑成的那一切障碍，像疾风扫敗叶一般一扫而光^⑩。但这种情形使我們感到兴趣的现在还有另一方面，即如下一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

① 讓我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清楚地証明这种人的情感何等强烈。費拉尔公爵夫人勒奈（路易十二的女儿）在她給自己的教師加爾文的信中写道：“我当然沒有忘記你所写給我的那些話：大卫对上帝的敌人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也始終不会持另一种态度；要是我知道国王，耶我的父亲，王后，耶我的母亲，以及我已故的夫君（feu monsieur mon mari）和我所有的儿女是为上帝所摒弃了的話，那我就会對他們怀不共戴天的仇恨，惟愿他們落入地獄”等等。怀有这种情感的人，能够表现出无坚不摧的何等可怕的毅力呵！而这些人都是否认意志自由的哩。

志不自由只是表明我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作的那样去作时，当我了解我的这种行动同时也是各种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的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識中必然性是与自由同一的，自由是与必然性同一的，于是我不自由的意思就只在于我不能违反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不能使二者彼此对立，不能觉到我自己是受必然性所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也正是自由的最充分的表现。

齐美尔說过，自由总是指摆脱什么东西而言，自由若不了解为与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决不能根据这种細微、粗浅的眞理来推翻哲学思想所曾作出的一种最卓越的发现，即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这一原理。齐美尔所下的定义太狹隘了：这一定义仅仅是指不受外部拘束的那种自由而言。当所談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就是可笑已极的了：一个想从你的衣袋中偷去新手帕的小偷遇到你阻止他这样做，而他又还没有什么办法打破你这种抵抗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自由偷去你这个手帕的。但是除了这种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一种比这深刻得无比的自由概念。不能进行哲学思維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自由概念的，而且能够进行这种思維的人，也只有已經摆脱二元論，并了解主体与客体間根本没有二元論者所設想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鴻沟时，才能領会到这种自由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用他們的烏托邦理想来同我国資本主义的现实相对立，并且不能超过这种对立一步。主观主义者陷进了二元論的泥潭。那些所謂俄国“学生們”的理想，其近似資本主义现实的程度是比主观主义者的理想少得不可計量的。虽然如此，这些“学生們”毕竟找到了把理想与现实連接起来的桥梁。“学生們”的见解提升到一元論了。在他們看来，資本主义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进程而走向它本身的否定，因而走向使他們——俄国“学生們”，并且不只是俄国“学生們”——所怀抱的理想见諸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学生們”也就充当着这种必然性的一种工具，并且他們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因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特性，也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既然他們的社会地位使他們正是具有这种特性而不是具有別种特性，于是他們也就不仅充当实现必然性的工具，不仅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而且还热情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就是自由的方面，而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起来的，更正确点說，这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变成了自由的必然性^①。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某种拘

① “Die Notwendigkeit wird nicht dadurch zur Freiheit, dass sie verschwindet, sondern dass nur ihre noch innere Identität manifestiert wird”.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ürnberg 1816, zweites Buch, S. 281. [“必然性所以变成自由，并不是因为必然性已归于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那暂时还是內在的同一性表现了出来。”黑格尔：《邏輯学》，1816年紐伦堡版，第2册，第281頁。] 12

束的自由；它也是与某种約束对立的：深刻的定义并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們并把它們包括在自身中。那末，在这种场合，究竟还可談到什么拘束，什么約束呢？显然，这里可以談到的是足以使尙未擺脫二元論的人們的毅力受到阻碍的那种精神上的拘束；可以談到的是不善于在那把理想与现实分隔开来的鴻沟上架起一座桥梁的人們所感到苦恼的約束。当一个人还没有用哲学思想上的英勇努力爭得这种自由时，他还不能完全享有自由，不能不因遇見那种与他对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耻的苦痛。可是当他一旦摆脱这种苦恼和可耻的拘束重压，而他的自由活动已成为必然性的自觉和自由表现时，那他就会获得他从来所不知道的一种崭新的完滿的生命了^①。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世上沒有什么东西能阻碍他，而且沒有什么东西会阻住他如

天雷神电
轰击妖邪……

三

再重复說一遍：对于某种现象的絕對必然性的認識，

① 这位老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又卓絕地說过：“Die Freiheit ist dies, Nichts zu wollen als sich”. Werke, B. 12, S. 98.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自由不过是个人本身的确立而已”，《全集》，第 12 卷，第 98 页。（宗教哲学）]

只会加强同情于此种现象并认为自己是引起此种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这样一个人认识了该现象的必然性以后却竟袖手旁观，那就只是表明他不懂得算术而已。例如，我们假定说某种条件总和 S 具备时，现象 A 就必然要发生。你已经向我证明，这个总和中的一部分已经具备，另一部分到 T 时就会具备的。于是热烈同情于 A 现象的我确信了这点之后，便赞叹道：“妙极了！”说罢便躺下鼾睡起来，一直睡到你所预测的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是如下所述。在你的计算中，在现象 A 发生所必需的条件总和 S 中，本来是把我的活动也包括在内的，——假定这种活动是等于 a 。但因为我鼾睡去了，于是在 T 时所有促进这一现象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 S ，而是 $S-a$ ，这当然会使情况有所改变的。也许那时忽然有另一个人来替代我，此人本来也是近于无所作为的，不过幸亏他因看见我消极冷淡得太岂有此理而极感愤慨。在这种情形下，力量 a 就会由力量 b 所替代，而如果 a 等于 b ($a=b$)，那末促进现象 A 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仍然等于 S ，而现象 A 也终究会在 T 时发生。

但是假如不能认为我的力量是等于零，假如我是个灵巧能干的工作者，假如没有什么人来替代我，那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 S ，而现象 A 也就发生得比我们所预料的迟些，或是不会发生得如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满，或

是甚至完全不会发生。这是个明如白昼的道理，如果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以为在我背叛以后 S 仍然是 S ，那只是因为我不会計算而已。然而是否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計算呢？你曾向我預言过在 T 时一定会有总和 S ，而你却没有料想到我同你談話后就立刻跑去睡觉了；你竟确认我始終是个很好的工作者；你竟把不很可靠的力量看成了很可靠的力量。可见，你也計算得不好。但是，我們就假定你絲毫也沒有弄錯，而是把一切都考慮到了吧。那末你的計算就会是如下所述：你說在 T 时总 和 S 就会具备的。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有一个負数，即我的背叛；同时这中間还包括有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因确信其意向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而受到的那种鼓舞作用。在这种场合，总和 S 就会真正在你所預料的那个时刻具备，而現象 A 也就会发生。这大概是很明白的了。既然这很明白，那末究竟为什么我竟会因想念到現象 A 的必不可免而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我会觉得这种必然性注定使我无所作为呢？为什么我談論这种必然性时，竟会把最簡單的算术法則忘記了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的那种教育养成了我这种极想无所作为的癖性，而我同你进行的談話又使我这种劣根性一触即发。不过如此而已。

对于必然性的認識在这里不过是成了我的精神萎靡不振借以暴露出来的誘因。要把它当作造成我这种頹唐习性的原因是絕對不可能的：原因并不是对于必然性的认

識，而是在于我受到的那种教育。由此可见……由此可见，——算术原来是一門非常可敬和十分有益的科学，它的法則甚至是哲学家先生，甚至特別是哲学家先生不应当忘記的哩。

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对某种现象的发生不表同情，并設法加以阻撓，那末他对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的认识，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行为呢？这里的情形就有点不同了。这种认识很可能削弱他的反抗的力量。但是反对某种现象的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信服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經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們对于这一现象到来的必然性的认识，以及他們的力量的衰落，这都不过是促使該现象发生的种种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也要算在促使該现象发生的有利条件之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反对該现象的人都会减弱其进行反抗的努力。其中有些人恰好会因认识到此一现象的必然性而加紧进行反抗，以至于拚命掙扎。在一般历史上，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表明这种拚命掙扎的大有教益的例子。这种例子想必讀者自己也能够記憶起来，而无須我們来多費唇舌吧。

說到这里，卡列也夫先生就来打斷我們的話，当然，他虽則不贊成我們对于自由与必然性的观点，并且不贊同我們偏袒意志坚强分子的“极端行为”的态度，但他終

究怀着滿意的心情在我們杂志上讀到个人能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这种意见。这位可敬的教授高兴地叫喊道：“我向来都是这样說的呀！”这話倒也不錯。卡列也夫先生以及所有的主观主义者向来都认为个人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作用。曾經有过一个时期，他們因这样主张而博得一班先进青年方面很大的同情，这班青年极力想从事公益事业的高尚劳作，所以自然极为重視个人首創精神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主观主义者不仅始終沒能解决，甚至沒能正确提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他們把“能批判地思維的个人”的活动跟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影响对立了起来，因而創造出了一种似乎新颖的因素論：能批判地思維的个人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这个运动本身的規律則是另一种因素。由此就得出了种极不合理的观念，只有当那些积极的“个人”还专心致志于实际迫切問題，因而无暇研究哲学問題的时候，这种观念才勉强可以使人滿意。而当八十年代到来的沉寂时期已使那些能够思考的人获得一种出乎心愿之外的閑暇功夫来从事哲学思考的时候，于是主观主义者的学說便显得破綻百出，甚至好像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①那件鼎鼎大名的外套一样根本破烂了。无论怎样修补也补不成功了，于是能够思考的人就相继抛弃了主观主义这个分明全无根据的学

① 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是果戈理的小說《外套》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小官僚的典型。——校者注

說。但是，正如在此種場合常見的那樣，這一學說所引起的反感竟使某些反對這一學說的人走到了另一極端。某些主觀主義者為了盡量抬高“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認人類歷史運動是規律性的過程，現代某些反對主觀主義者的人却為了盡量強調這種運動的規律性而顯然決意要把歷史是由人所創造，因此個人的活動在歷史上不能不發生作用這一原理置之腦後了。他們把個人看成是 *quantité négligeable* [值不得注意的東西]。這種理論上的極端性是與最狂熱的主觀主義者所犯的那種極端性同樣不能容許的。為了反題而犧牲正題，也如為了正題而忘掉反題一樣，同樣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有把正題與反題中間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統一成為一個合題的時候，才能找到正確的觀點^①。

四.

這個課題早就使我們感到興趣，因此我們早已想請讀者同我們一起來解決它。但是我們因有一些顧慮而沒有這樣作：我們以為我們的讀者也許自己已經解決了這個課題，因而我們的提議未免太遲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這種顧慮了。德國史學家使我們打消了這種顧慮。這是真情實話。原來最近一個時期在德國史學家中間發生了

^① 在追求合題方面，那位卡列也夫先生也搶過了我們。只是可惜他沒有超出認為人是靈魂和肉體所構成的這個真理一步。

关于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激烈爭論。有的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中主要的和几乎是唯一的原动力，而另一些人則断言这是一种片面观点，說历史科学不仅应当注意到伟人的活动和政治历史，并且要注意到全部历史生活(*das Ganze d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卡尔·兰普勒赫特就是后一派中的一分子，他著有《德国民族史》一书，此书已由尼古拉也夫先生譯成了俄文。反对兰普勒赫特的人責备他主张“集产主义”，主张唯物主义，甚至把他——*horribile dictu!* [真是言之可怕!]——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神論者”混为一談，如他自己在爭論結語中所說的那样。我們認識了他的观点以后，才知道人們加給这位可怜学者的种种罪名，都是毫无根据的。同时我們又知道了现代德国史学家沒有能力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于是我們就认为自己有权来設想，这个問題对于某些俄国讀者來說至今也还是沒有解决的，因而关于这个問題现在也还可以說一点并非全无理論和实践价值的話。

兰普勒赫特搜集了一大批 (*eine artige Sammlung*, 像他自己說的) 国家杰出人物对于自己的活动与其所处历史环境間的关系的见解；但他在爭論中暫时还只援引过俾斯麦所发表的某些演說和意見。他引証了鐵血宰相于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議会中所說的如下一段話：“諸位，我們既不能忽視已往的历史，也不能創造

未来。有人常将自己的表針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就能把時間加快，但这实在是一种錯誤，我希望諸位加以避免。人們通常过分夸大了我对于我所依靠的那些事变的影响，可是毕竟沒有一人想到要我來創造历史。即使我同諸位联合起来作这也是办不到的，雖說我們联合起来便能与全世界相抗。然而我們毕竟不能創造历史；我們应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我們把灯火放在果子下面，决不会使果子的成熟加速；而如果我們把尙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是只会妨碍果子成长并使其腐坏的”。兰普勒赫特又根据若里所作記述引录了俾斯麦在普法戰爭时期說过多次的意见。这些意见大体上也还是說：“我們不能創造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适应事物的自然进程，应当只限于保証得到已經成熟的东西”。兰普勒赫特认为这是个深刻而完备的眞理。在他看来，现代的历史学家只要善于探索事变的深处，而不把自己的視野局限于太短的一段時間中，就不会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經濟时代去呢？这是他在他权勢最高的时候也做不到的。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意志最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伟大人物是种“經驗上既定的必然性”。

兰普勒赫特的意见就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万有史观。这个“万有”史观的弱点，是不难发现的。他所援引的俾斯麦的意见是很有趣味的一种心理証据。对

于这位前德国宰相的活动尽可不表同情，可是决不能說他这种活动微不足道，决不能說俾斯麦是个带有“无为主义”色彩的人。拉薩尔論到俾斯麦的时候說过：“反动势力的僕役并不长于談吐，但愿进步势力能多有一些这样的僕役”^①。这样一个有时表现出真正鋼鐵般意志的人竟也自认为在事物的自然进程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显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已；这件事又一次証明，一个从必然性来观察现象的人，同时又可能是个意志很坚强的活动家哩。但也只有在这一点上，俾斯麦的意见才值得注意，若要用他这种意见来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就絕對不行了。据俾斯麦所說，事变是自行造成的，我們只能保証得到事变所准备好了的东西。但是，每次“保証得到”的举动也是一种历史事变：这种事变与那些自行造成的事变究竟有何区别呢？其实，几乎每一次历史事变一方面既是“保証”某人得到先前发展过程中已經成熟的果实，同时又是准备未来果实的那些事变鏈条中的一环。試問怎能把“保証得到”的举动与事物的自然进程对立起来呢？显然俾斯麦是想說，在历史上活动的个人或集团从来不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

① 拉薩尔在《論宪法的实质》这篇讲演中論到俾斯麦时曾說：“君王的僕役并不是长于談吐的人，人民的僕役則往往长于談吐。他們是实际的人，本能地理解問題何在”（见拉薩尔《演說和著作集》（三卷集）新版，1892年柏林〔F. Lassall's Reden und Schriften, Neue Gesammt-Ausgabe, Berlin, 1892〕，第1卷，第493頁）。——校者注

是万能的。这点当然絲毫也不容置疑。但我們还是想要知道：他們的力量——固然是远非万能的力量——究竟依什么为轉移；这种力量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增长起来，在什么情况下又会減少下去呢。对于这些問題，无论俾斯麦自己，亦无论那位援引俾斯麦言論的博学的“万有”史观的維护者，都沒有給予回答。

誠然，我們在兰普勒赫特那里也可讀到一些較为值得玩味的引証^①。例如，他从法国现代史学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莫諾的作品中引証如下一段話：“史学家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的那些光輝灿烂、显赫一时的表现，注重伟大的事变和伟大的人物，却不去描繪經濟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緩慢的运动，这种經濟条件和社会制度正是人类发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暫时性质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內可以归結为规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加以精确分析的。其实，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两者是人类发展中各个时机的符号和象征。至于大多数所謂历史事变，則它們对于真正的历史，就好像海面的波浪对于来潮和退潮的深邃而經常的运动一样，它們在海面上发生，一时光彩灿烂夺目，隨后一触着沙岸，就被击破而不留任何痕迹”。兰

① 我們在此地且不去說兰普勒赫特的其他哲学历史論文，始終只是讲他的論文《Der Ausgang des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Kampfes》，《Die Zukunft》，1897，№ 44. [《历史科学战斗之結局》，《未来》杂志，1897年，第44期。]

普勒赫特声明說，他对于莫諾这段話中每一句話都极表贊同。大家知道，德国学者不爱贊同法国学者，而法国学者也是不爱贊同德国学者的。因此，比利时史学家皮萊恩就在《Revue historique》[《历史評論》]上兴高采烈地強調了莫諾的历史观点与兰普勒赫特的历史观点这样吻合的事实。他說：“这样一种吻合极为重要，它显然証明未来是属于新的历史观点的”。

五

我們可不能对皮萊恩所抱的这种愜意的愿望表示贊同。未来不可能属于含糊曖昧的观点，而莫諾，尤其是兰普勒赫特的观点，却正是这样的观点。把研究社会制度和經濟条件看作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的学派，当然不能不受到欢迎。当这个学派在历史科学中最終巩固时，历史科学就会获得长足的进步。但是，第一，皮萊恩把这个学派当作新学派看待，这是錯誤的。历史科学中这一学派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产生了：基佐、米涅、奧古斯丹·梯叶里，以及后来的托克維尔等人，便是这个学派中卓越和一貫的代表人物。莫諾与兰普勒赫特的观点，不过是从一个陈旧然而頗为光輝的蓝本上摹印下来的一种模糊的摹本罢了。第二，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史学家的观点在当时說来无论怎样深刻，但其中还有許多东西沒弄清楚。在他們的观点中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

用問題沒有給予一个确切圓滿的回答。然而历史学家如果真要摆脱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片面观点，那末历史科学确实是應該解决这个問題的。未来是属于对这个問題也能給予一个最好答案的学派的。

基佐、米涅以及該派其他史学家的观点是十八世紀的历史观点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是十八世紀的历史观点的反題。十八世紀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誠然，当时也有过一些越出一般常规的例外：例如，維科、孟德斯鳩或海德的哲学历史眼界，就要宽广得多。但我們现在所讲的并不是这种例外；至于十八世紀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却是正如我們所說过的那样去观察历史的。就这方面來說，现在把例如馬布利的历史著作重讀一下，是很有趣味的。据馬布利說，克里特島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由米諾斯一手造成的，萊喀古士对于斯巴达的貢献也是如此。斯巴达人之“鄙弃”物质財富，正是应当归功于萊喀古士，因为他“深深钻进到同胞們的心坎里去压倒了爰財心理的萌芽”(*descendit pour ainsi dire jusque dans le fond du cœur des citoyens etc.*)^①。而斯巴达人后来离开英明的萊喀古士指点給他們的这条道路，却应归罪于萊山得，因为萊山得居然叫他們相信

① 参閱 «Oeuvres complètes de l'abbé de Mably», Londres 1789, tome quatrième, p. 3, 14—22, 34 et 192. [《馬布利全集》，1789年伦敦版，第4卷，第3, 14—22, 34 和 192 頁。]

“新时代和新环境要求他們采取新规則和新政策”^①。用这种观点写成的作品，实在与科学很少相干，不过是专为引伸出一些所謂道德“教訓”而写述的一种教义罢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观点。經過十八世紀末叶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經絕不可能設想历史是某些較为杰出的人物或較为高尙开明的人物所一手作成的事情，以为他們能够隨心所欲，用某种情感和观念去訓示那些沒有知識而又唯命是听的民众了。况且，这种历史哲学又还激怒了資产阶级理論家的平民自尊心理。这里可以看出早在十八世紀資产阶级戏剧发生时期就已經表露出来的那种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反对旧的历史观点时，又还运用过博馬舍等人所提出来反对旧的审美观的那些論据^②¹³。末了，法国不久前所經历过的风暴时期，又很明显地証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决非只是由人們自觉的行为所决定；单是这一情况已不免使人想到，此种事变是在一种隐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发势力那样盲目地而又依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作用着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实（虽然我們知道，这件事实至今沒有任何人指出过）是：把历史看作一个規律性過程的这种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在論

① 參閱《Oeuvres complètes de l'abbé de Mobly》，Londres 1789, tome quatrième, p. 109. [《馬布利全集》，1789年伦敦版，第4卷，第109頁。]

② 請拿論《法国历史》的第一封信与博馬舍的《Oeuvres complètes》[《全集》]第1卷中的《Essai sur le genre dramatique sérieux》[《严肃戏剧論》]一文对照。13

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极为彻底地發揮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两人的著作就是如此¹⁴。沙多勃利昂把新的历史学派称为宿命論派。他論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所提出的任务时說道：“这种學說要求历史学家論述最残忍的暴行时不表憤慨，說到最高尚的德行时不表爱戴，用冰冷的眼光觀察社会生活，认为社会生活不过是不可抵抗的规律的表现，而由于这种规律，一切现象都正如它們所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发生”^①。这种說法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并沒有要求历史家持冷眼觀察态度。奧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說过，政治热情磨炼着研究者的头脑，能成为发现眞理的强有力手段^②。所以只要稍微看看基佐、梯也尔¹⁶或米涅的历史作品，就可知道他們热烈贊助过资产阶级对世俗貴族及宗教貴族进行的斗争，同样也贊助过资产阶级压制新兴无产阶级要求的企图。然而有一件事实是不容爭辯的，即新历史学派是发生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当时貴族已被资产阶级打败了，虽然它还企图恢复某些旧有的特权。在新学派历史学家們的所有一切議論中都反映出他們那个阶级以获胜自豪的意識。既

① «Oeuvres complètes de Chateaubriand», Paris 1860, t. VII, p. 58. [《沙多勃利昂全集》，1860年巴黎版，第7卷，第58頁。]此外还請讀者注意下面一頁；这一頁簡直令人觉得是由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执笔写成的¹⁵。

② 参閱«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法兰西史漫談》]附录于«Re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paris 1840, p. 72. [《墨洛溫王朝史話》，1840年巴黎版，第72頁。]

然资产阶级从来未曾有过骑士气概，所以从它那些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議論中，往往可以窺见对待被战胜者的残忍态度。基佐在他的一本論战性的小册子中說过：“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et cela est de droit”（“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也是同样残忍的。这种残忍态度有时竟表现成为冷酷无情，因而就使沙多勃利昂发生誤会。此外，究竟應該怎样来了解历史运动的規律性，当时还不完全明白。末了，新学派之所以会使人觉得它是个宿命論派，正是因为它力求坚持規律性的观点，而很少注意到伟大的历史人物^①。受过十八世紀历史观念熏陶的人們当然是很难容忍这种观点的。所以，这些新历史学家也就受到各方面紛至沓来的反駁，因而发生了我們已經說过的至今尚未結束的那种爭論。

1826年1月，圣博甫在《Globe》[《地球》杂志]¹⁷上論及当时出版的梯也尔¹⁸所著《法国革命史》第五、第六两

① 圣博甫在其評論米涅著《法国革命史》第三版的一文中，把这位史学家对人物的态度評述如下：“A la vue des vastes et profondes émotions populaires qu'il avait à décrire, au spectacle de l'impuissance et du néant où tombent les plus sublimes génies, les vertus les plus saintes, alors que les masses se soulèvent, il s'est pris de pitié pour les individus, n'a vu en eux pris isolément que faiblesse et ne leur a reconnu d'action efficace, que dans leur union avec la multitude”。〔“当他看见他所必須記述的那些广大深入的民变时，他眼看那些最高尚的圣哲和最純洁的善人在民众起义的场合显得毫无办法和毫无力量，对人物便不禁为之伤感，认为人物孤独來說总是軟弱无力，认为他們不同群众結合便不能有何实际作为”。〕

卷时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行程添加一种意外的、变化无常的新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事变行程变更方向，但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其变化无常而令人无法测量。”

决不要以为圣博甫曾认定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似乎是沒有任何原因的。要是这样設想，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他只是认定，在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地起着重要作用的人們在智能上和精神上的特性，即才能，知識，坚决或犹豫，勇敢或胆怯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結局发生显著的影响，而这些特性又不能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它們永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叫做私人生活中的偶然现象的影响下形成的。我們且举几个例子来把这个显然不說自明的思想說明一下。

在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¹⁹时期，法国军队获得过几次輝煌的胜利，法国当时显然能从奥地利方面获得现今比利时境內很大一部分領土的让步；但路易十五却并沒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他——据他自己說——并非以一个商人資格而是以一个国王資格进行战争的，所以亚琛和約也就使法国一无所得²⁰；但假如路易十五具有另外一种性格，或者換上另外一个国王，那末法国領土也許会扩大起来，而它的經濟和政治发展进程也就会稍有不同了。

大家知道，法国进行七年战争²¹时已經同奥地利結

成聯盟了。據說，這次聯盟的締結，彭帕杜爾夫人出力甚大，她深以驕傲的馬麗亞-特列莎在寫給她的信里稱她做表妹或亲爱的女友(*bien bonne amie*)為幸。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點，或者如果他不是那样厉害地屈服于他那些宠妃的影响，那末彭帕杜爾夫人也就不会对事变进程起这样的作用，而事变也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其次，七年戰爭結果是于法國不利的²²：法軍將領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敗。而且他們的举动根本就是异常奇怪的：黎塞留专干擄掠勾当，苏俾茲和布洛利兩人經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洛利在維里豪尊一帶对敌人实行攻击时，苏俾茲虽听见了炮声，但他却没有依照預先約定并且显然是他所應該作的那样去援助这位同僚，結果竟使布洛利不得不实行退却^①。而袒护这个极其庸碌无能的苏俾茲的仍是那位彭帕杜爾夫人。所以我們又可以說：假如路易十五不是如此好色成性，或者，假如他这位宠妃沒有干預政事，那末事变的結果也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國的。

据法國历史学家說，当时法國根本不應該在欧洲大陸作战，而應該集中全力到海上去保卫法國的殖民地以

① 有些人却說当时錯的不是苏俾茲而是布洛利，因为布洛利不愿同同僚分沾功名，所以沒有等候他来援助。但这对于本題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絲毫不能改变事情。

免英國侵占。法國之所以沒有這樣去作，又是由於彭帕杜爾夫人的過失，因為她始終想在她那位“親愛的女友”馬麗亞-特列莎面前討好。由於七年戰爭的結果，法國喪失了最好的殖民地，而這對法國經濟關係的發展無疑是有重大影響的。女人的虛榮心理在這裡竟成了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強大“因素”。

還需要舉出其他例子來說明麼？那末就讓我們再舉一個也許是最鮮明不過的例子來說說吧。就在這個七年戰爭時期，1761年8月間，奧軍在西里西亞同俄軍匯合之後，把當時駐扎在施特里高一帶的腓特烈的軍隊包圍起來了。腓特烈處境危急萬分，但聯軍却一再遷延攻擊，而布圖林將軍在敵軍面前停駐20日之後，甚至完全退出了西里西亞，只留下一部分軍隊去支援奧將牢敦。牢敦占領了距腓特烈軍隊據守地點很近的什維尼茨城，但這次勝利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若是布圖林的性格堅決一點，那結果又會怎樣呢？若是聯軍向腓特烈舉行了攻擊，使其無法筑壘固守，那結果又會怎樣呢？也許聯軍會把腓特烈徹底擊潰，使他不得不接受勝利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料經過幾月後就發生了一次偶然事件，即俄國女皇伊麗莎白逝世，結果竟使局勢一下子就變得大大有利於腓特烈了²³。試問：假如布圖林比較堅決一點，或者說，假如當時擔任指揮職務的不是他而是如蘇沃洛夫這樣的人，那結果又會怎樣呢？

聖博甫批判“宿命論派”歷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說了值得我們注意的另一种意见。他在我們已經摘引过的那篇論米涅的《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认为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結局的不仅有引起这次革命的一般原因，也不仅有这次革命反过来所激起的种种情欲，并且还有常被一般研究家忽略过去，甚至完全不能算作真正称为社会现象的許多細小現象。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由它們所引起的)种种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自然界的物理和生理力量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石头仍然受着重力的支配；血液也沒有停止循环。假若米拉波未因偶患寒热病死去，假若罗伯斯比尔忽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或因患中风病死了；假若拿破仑中弹殞命了，那末事变的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么？难道你們敢于斷定說事变的結局仍然是那样的么？当我所假定的种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事变的結局就会与你們所认为不可避免的那种結局完全相反。而我假定出这类偶然事件是有理由的，因为无论革命的一般原因或是这些原因所引起的那些情欲都不能排斥这类偶然事件。”接着，他又援引人所共知的意见，說要是克里奧帕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历史进程也許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①；最后，他认为虽然

① 巴斯噶(Pascal, Blaise 1623~1662)在他的《思想录》中曾說：“要是克里奧帕特拉的鼻子短一些，地球的整个面貌都将改变”。(《Pensées》 viii, 29)。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显然是指此而言。——校者注

可以說出許多理由來為米涅的觀點辯護，但他還是再次指出米涅錯誤的地方。他說：米涅把一切結果都歸因於一般原因的作用，殊不知這些結果同時也是由其他許多細小曖昧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的；米涅的嚴謹的頭腦，好像根本不願承認他所認為沒含有一定秩序和規律性的那些現象存在。

六

聖博甫的這種異議，是不是站得住腳呢？看起來似乎有些道理²⁴。究竟有多少道理呢？為了確定有多少道理，我們首先就要把認為人能“用自己意志的突然決定”來給事變進程添進一種新力量而使其大大改變的這種意見考察一下。我們已經舉出了我們認為極能說明這種意見的一些例子。現在我們來把這些例子仔細思索一下。

大家知道，當路易十五在位時代，法國的軍事力量愈益衰落下去。據昂利·馬丁所說，在七年戰爭時期，法國軍隊始終都有許多妓女、商人和僕役跟着，軍中輜重馬匹要比乘騎馬匹多兩三倍，所以這個軍隊與其說是圖倫和古斯達夫-阿道爾夫那樣的軍隊，不如說是大流士和薛西斯那樣的烏合之眾^{①25}。阿恒荷爾茨在記載這次戰爭經過的著作中指出說，當時法軍中被指定放哨的軍官，往往隨

① «Histoire de France», 4-ème édition, t. XV, p. 520—521. [《法國歷史》，第4版，第15卷，第520—521頁。]

便离开哨所跑到邻近地方去跳舞，只有他們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肯执行上司的命令。法國軍中情形这样恶劣，是由于貴族阶层衰敗，——但当时这个阶层仍然把持着軍中一切高級职位，——以及迅速陷于毁灭的全部“旧秩序”普遍解体的緣故。单是这些一般原因，已經完全足够使法國在七年戰爭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了。但是，苏俾茲一类將領的庸碌无能显然又使法軍由一般原因决定的那种失利危险更加增多起来。既然苏俾茲的地位是全靠彭帕杜爾夫人来支持，那末我們就必须承认，这位貪求虛榮的夫人乃是大大加深了一般原因对法國在七年戰爭时期的情况不利影响的一个“因素”。

彭帕杜爾侯爵夫人之所以强而有力，并非由于她自己有什么力量，而是因为大权在握的国王听从她的意旨。能不能說路易十五的性格按照法國当时社会关系发展进程定应如此呢？不能这样說。在当时同样的发展进程中，也可能出現一个用別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聖博甫也許会說，这里只要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曖昧的生理原因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他这样說，那他說的就是正确的。但由此就应得出結論：既然这种曖昧的生理原因影响到七年戰爭的进程和結局，也就影响到了法國后来的經濟发展，要是法國在七年戰爭中沒有失去一大部分殖民地，它的經濟发展也許会是另一种样子哩。試問这个結論是否与社会发展規律性的概念相抵触呢？

不，絲毫也不相抵触。个人的特性在上述场合发生作用是没有疑問的；但这种作用只有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才能发生，也同样是沒有疑問的。在罗斯巴哈会战后，法国人民对于庇护苏俾兹的这位女人极表憤慨。她每天都收到許多充滿威胁詈罵的匿名信。因此彭帕杜尔夫人深为焦慮，寝不安席^①。虽然如此，但她还是极力支持苏俾兹。1762年，她在致苏俾兹的信中一面責备他有負厚望，接着便补充說：“但您不必畏惧，我会照顾您的利益，竭力为您向国王斡旋”^②。可见，她并没有对法国社会輿論让步。为什么她沒有让步呢？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法国社会沒有可能迫使她让步。为什么当时的法国社会不能做到这点呢？原来是当时法国社会的組織妨碍了这一点，而这种社会組織又是由当时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决定的。由此可见，使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宠妃的癖性竟能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样一种悲惨影响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如果具有这种宠爱女人的弱点的不是国王本人，而是王室中某一个厨司或馬夫，那末这种弱点就不会发生什么历史作用。可见，問題并不在于这种弱点，而是在于具有这种弱点的人所占的社会地位。讀者当然懂得，这种論断对于上述其他一

① 參閱《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Paris 1824, p. 181. [《霍雪夫人的回忆录》，1824年巴黎版，第181頁。]26

② 《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Londres 1772, t. I. [《彭帕杜尔夫人书簡》，1772年伦敦版，第1卷。]

切例子也都是适用的。在运用这种論斷的时候把应当改換的对象改換一下就行了，例如把法国换成俄国，把苏俾茲换成布图林等等。因此，我們也就不去重复了。

由此可见，个人因其性格的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組織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許的那个地方、时候和程度內，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

也許有人会說，个人影响的范围也与个人的才能有关系。是的，我們同意这种意见。但个人只有在社会上占有为此所需的地位时，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竟能操在一个既沒有什么能力，也沒有什么热心去替社会服务的人物手中呢？这是因为法国当时的社会組織就是如此。正是这种社会組織决定了某些賢明人物或庸碌分子在某某时候所能起的作用，因而也就能表现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

个人的作用既然是由社会的組織来决定，那末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抵触呢？个人的社会影响不仅不与这种概念相抵触，并且是对这种概念的一种最鮮明的証实。

不过这里必須說明一点。既然受社会組織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有可能表现出来，于是就給所謂偶然現象

对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的影响开了方便之門。路易十五的好色成性，原是他那种体质的必然結果。但这种体质对于法国一般发展进程却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然而我們已經說过，这种体质对法国后来的命运不是沒有发生影响，而是成了决定这种命运的一种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是由于完全合乎规律的那些病理作用的結果。但这种病理作用的必然性，并非由法国一般发展进程所引起，而是由这位著名演說家个人体质上的某些特点以及他感染疫症时所处的那些物理条件所致的。这些特点和这些物理条件，对法国一般发展进程來說是种偶然的现象。可是米拉波之死却影响到了法国革命后来发展的进程，成了决定这个进程的諸原因中的一种原因。

在上述那个說明腓特烈二世只是因为布图林优柔寡断才得逃出困境的例証中，偶然原因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布图林被任为俄軍总司令一事，甚至对于俄国的一般发展进程也可說是我們所认定的那种偶然性的现象，而对于普魯士的一般发展进程說来，当然更是毫不相干的。但实际上我們却很可断言，只是由于布图林优柔寡断，才使腓特烈逃出了絕望的境地。如果当时被任为俄軍总司令的不是布图林而是苏沃洛夫，那末普魯士的历史进程也許会成为另外一种样子。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候还会由一些可說是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来决定哩。

黑格尔曾說：“In allem Endlichen ist ein Element des

Zufälligen"(一切有限現象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①。我們在科学中所考察的只是“有限現象”；因此可以說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这是否会使对于各种現象的科学认识成为不可能呢？绝对不会。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欧洲人在美洲出现，对于墨西哥和秘魯土人說来是种偶然的现象，因为这种現象并不是从这几个美洲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但西欧人在中世紀末期倾心于航海事业却不是偶然現象；欧洲人的力量很快就打破了土人的反抗，也不是偶然現象。同样，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而引起的后果，也不是偶然的；这种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两种势力的合成功力所决定：一方面是各被征服国家的經濟状况；另一方面便是各征服国家的經濟状况。而这两种势力及其合成功力，是完全可以作为严格科学的研究的对象的。

七年战争中的偶然現象，对于普魯士后来的发展史有重大的影响。可是，如果当时普魯士处于另一种发展阶段，那末这些現象所发生的影响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偶然現象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两种势力的合成功力

①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后面所附《关于証明上帝存在的讲演录》第八讲脚注中說：“有限事物的一个规定就是偶然性，因此是关于世界的偶然性的証明”（Die eine Bestimmung der endlichen Dinge ist die *Zufälligkeit*, daher der Beweis e contingentia mundi.）见拉松（Lasson, G.）版《黑格尔全集》第14卷下半部第70頁。
——校者注

决定的：一方面是当时普魯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另一方面是当时影响了普魯士的那些欧洲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可见，就在这里，偶然性也絲毫沒有妨碍对于各个现象的科学的研究。

由此可知，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結構及其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但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我們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考察一下。

圣博甫以为他所指的那种細小曖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时，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們所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了。这是个严重的錯誤。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細小原因錯綜結合得怎样奇巧，但它們决不会消除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巨大社会需要；当这些需要尚未得到滿足时，法国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能有一种与当时实际的結局相反的結局，就必须用相反的需要来代替这些需要；但这当然是任何一种細小原因的湊合也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是在于当时的社会关系的特性，而圣博甫所假定的那些細小原因却只能根源于个別人物的个人特点。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的状况所取决于个別人物的个人特点的地方，至多也不过是这种人物对于从事技术改良、技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的大小。圣博甫所指的并不是这种特点。可是

其他任何特点都不会使个別人物能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状况，因而也就不能直接影响到为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即經濟关系。当經濟关系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状况的时候，那末一个人物无论有怎样的特点，也不能消除这种經濟关系。但是一个人物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滿足在当时經濟关系基础上所产生的那些社会需要或阻碍这种滿足，却要由这个人物的个人特点来决定。十八世紀末期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要推翻陈腐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适合于法国新經濟制度的另一种政治制度。当时最有名望和最有益处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最能帮助滿足这种最迫切需要的人物。我們假定說米拉波、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米拉波未因早死退出政治舞台，那末情形又当怎样呢？那末，君主立宪党保持强大的力量就会較为长久，它对于共和派的抵抗也就会較为坚强。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无论怎样一个米拉波都不能防止当时共和派的胜利。米拉波的力量全靠民众的同情和信任来支持，而民众是趋向于共和制度的，因为当时朝廷那种頑强保护旧制度的政策激怒了民众。所以民众一知道米拉波不同情于他們的共和趋向时，就会不复对他表示同情，于是这位大演說家的影响就会丧失殆尽，結果他很可能就会成为他自己徒然竭力阻止的那个运动的牺牲品。关于罗伯斯比尔的情形大致上也可以这样說。我們假定說他在他的党内是个完全无可替代

的力量，但他毕竟不是这个党内唯一的力量。假如他在1793年1月²⁷間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了，那末当时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替代他，这个人物也許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他，但事变进程毕竟还是会按照罗伯斯比尔在世时所走的那种方向发展下去的。譬如說，吉伦特派^①在这种场合也会不免要遭受失敗；不过，罗伯斯比尔党丧失政权也許来得更早一些，因而我們现在就会不是說热月的反动，而是說花月、草月或稽月的反动²⁸。也許有人会說，罗伯斯比尔所采取的残忍恐怖手段，只是加速而不是延緩了他那个党的复亡。我們且不去考察这种假設，而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有根据的假設吧。这样一来，就会必須假定罗伯斯比尔党的复亡不是发生于热月，而是发生于果月，葡月或雾月：总而言之，这个事件也許发生得早一点，也許发生得迟一点，但它終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依靠的那个人民阶层并没有实行长久統治的能力。然而，无论如何也談不上会有与罗伯斯比尔所努力促成了的那种結果“相反的”結果发生。

我們就假定拿破仑在阿尔科拉会战²⁹时中弹殞命了，也不会有这种“相反的”結果发生。拿破仑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征伐中所作出的事情，是会由其他的將領

① 吉伦特派，十八世紀末法国资產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集团，因其首脑多出于吉伦特省而得名。該派主要代表主张共和的工商业資产阶级和农业資产阶级利益，1792年8月执政后与雅各宾派的斗争更形尖銳，走上反革命道路，結果被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起义所推翻，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小資产阶级上台执政。——校者注

作出的。这些將領也許沒有拿破仑那样的才能，也許不能获得那样辉煌的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还是会在当时各次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因为法国兵士比当时欧洲其他各国兵士都要优良得不可比拟。至于雾月十八日政变³⁰及其对法国资內生活的影响，那末，即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結局实质上想必也会与拿破仑在世时相同。因热月九日反动政变而受到致命重伤的共和制度，已經是奄奄待毙了。督政府³¹根本不能恢复擺脫了上层等級統治的資产阶级当时所渴望的秩序。当时为要恢复秩序，就需要有如西叶斯所說的那样一枝“宝劍”。起初大家以为这种宝劍使命可以由茹伯尔将军³²来执行，但当他在納威会战时陣亡以后，大家便提到莫罗、麦克唐納和贝尔納多等人了^①。拿破仑这个名字，还是后来才被提起的。如果他也像茹伯尔那样陣亡了，那末大家就根本不会談到他，而会提出另一枝“宝劍”来。自然，一个被事变抬上了独裁者地位的人物，應該孜孜不倦地钻营权力，坚毅果决地把一切阻碍他前进的人推开，并予以无情打击。拿破仑具有鐵一般的毅力，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惜一切的。但当时除他而外，也还有过不少坚强能干、貪图功名利祿的人物。他所掙得了的那个位置大概是不會空閑起来的。假定另一位将军爭得这个位置后，举动比較拿

① «La vie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 le vicomte de Broc», Paris 1895, pp. 35—36. [《布罗克子爵著第一帝国时代的法国生活》，巴黎 1895 年版，第 35—36 頁] 及往下各頁。

破仑温和一点，不会激起全欧洲的反抗，結果这位將軍就会是死在推勒里宮³³中，而不是死在圣赫勒納島^①上。那时，波旁王族就会根本无法回到法国来；这样的結果，对于他們說来，当然是与实际上所发生的那种結果“相反”，但对于法国整个國內生活說来，却是与实际的結果很少区别的。当这枝“宝剑”恢复了秩序，保証了資产阶级获得統治以后，資产阶级很快就会厌恶这枝“宝剑”所表现的那种軍营习惯和专制行为。于是就会有在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主义运动发生，斗争就会漸漸熾烈起来。既然那些“宝剑”不爱让步，那末仁慈的路易·菲力浦代替他所殷勤爱慕的同宗来登王位也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事变进程中的这一切变化，也許能局部影响到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并通过政治生活而影响到欧洲的經濟生活。但革命运动的最后結局終究是不会与实际的結果“相反”的。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們終究不能改变由別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

七

除此而外，还要注意到如下一点。我們在討論伟大

① 圣赫勒納島(St. Helena)是南大西洋中的一个島屿。1815年，拿破仑一世与普、奧、英、俄联軍作战失敗后，被放逐于該島，并于1821年死于該島。——校者注

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差不多总是发生一种錯觉。向讀者指出这一点，是会有益处的。

拿破仑既担起了挽回社会秩序的“宝剑”使命，于是就排除了所有其余的將軍担负这种使命的机会，虽然这些將軍中間也許有些人是能像他那样或差不多像他那样执行这种使命的。社会要有一个坚毅的軍事統治者这种需要一旦获得滿足，社会組織就堵住了其余一切有才能的軍人成为軍事統治者的途径。于是这种組織的力量就成了阻碍其余的这类有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由此就有我們现在所說的那种錯觉发生。一般人未免过分夸大了拿破仑个人的力量，因为他們竟把提出和支持了这种力量的全部社會力量通統归到他一个人份下去了。由是大家就觉得拿破仑个人的力量是唯一无二的力量，因为所有其余与他相类似的力量都沒有由可能变成为現實。而当人們听说假如沒有拿破仑情形就会不知怎样的时候，人們的想像就混乱起来，竟以为如果沒有拿破仑，就根本不会发生拿破仑个人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种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中，因某一个人物获得成功而妨碍另一个人物获得成功的情形，是要稀少得无比。但是人們在这方面也不能完全避免上述那种錯觉。当一定的社会局势在其精神代表人物面前提出某种任务的时候，那末这些任务在杰出人物尙未把它們解决以前是始終引

起杰出人物注意的。而当他們一旦解决这种任务，他們的注意力就会轉移到别的对象上去。当一个杰出人物 A 已把任务 X 解决时，从而他就把杰出人物 B 的注意力引开这个已經解决的任务而轉向另一个任务，即任务 Y。而当有人問到如果 A 还沒把任务 X 完成就不幸死去，那末結果又会怎样的时候，我們就会以为社会智慧发展的線索将因此中断。殊不知 A 死去之后，这个任务是会由 B 或 C 或 D 去担任解决的，所以虽然 A 不幸早死，社会智慧发展的線索依然是会完整无缺的。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能运用他的这种才能来对事变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別人更加适合那个时代的社會需要：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軍事才能，而是貝多芬的音乐才能，那他当然就不会做到皇帝。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³⁴。如果法国旧制度再延續七十五年之久，拿破仑也許終身也不过是个不大著名的波拿巴將軍或者上校^①。在 1789 年，达烏、德宰、馬尔蒙和麦克唐納还不过是少尉；贝尔納多还只是

① 那时，拿破仑也許会像他在法国革命几年以前所打算的那样到俄国军队中去服务。如果他果真去了，他或許能在俄軍反对土耳其军队的战斗或反对高加索山民的战斗中显一显身手，但是誰都不会想到这个穷困而頗有才能的军官，在情况順利的时候能够成为世界霸主。

个上士；霍什、馬尔索、勒非夫尔、皮士格律、米歇尔·奈、馬森那、弥拉特、苏尔特还是些軍曹；奥什洛还是个劍术教師；朗恩还是个染色工人；古維昂·圣西尔还是个演員；茹尔丹还是个小販；別西爾还是个理发师；布隆还是个排字工人；茹伯尔和茹諾还是法科学生；克莱贝尔还是个建筑师；摩尔退直到革命发生时还没在軍中服役^①。

若是旧制度至今仍然存在，那末现在誰也不会想到十八世紀末法国曾有过一些演員、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律师、小販和劍术教師，原来是些可能的軍事天才哩^②。

斯湯达尔說，一个与提提安同年，即1477年誕生的人，可以与拉斐尔（死于1520年）以及达·芬奇（死于1519年）同时度40年的生活，他可以与1534年逝世的柯列乔以及1563年死去的米开兰基罗同时生活很长一个时期，他当乔尔乔尼去世时还不过34岁，他能亲眼看见廷托勒特、巴撒諾、維洛涅則、罗曼諾和薩托等人；一句話，他能做一切伟大画家的同代人，不过看不见一百年后

① 参阅《Histoire de France》，par V. Duruy, Paris 1893, t. II, pp. 524—525
〔杜雷：《法国史》，1893年巴黎版，第2卷，第524—525頁。〕

② 路易十五在位时代，第三等級中只有舍維爾一人才升擢到了中将銜。路易十六在位时代，第三等級中人在軍中晋升的途径更感困难了。参看 Rambeaud,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sixième édition, t. II, p. 226. [兰波：《法国文明史》，第6版，第2卷，第226頁。]

才出現的波羅尼學派^①中的人物^②。同樣也可以说，一個與沃弗曼同年誕生的人几乎能親身同荷蘭所有一切伟大画家相識^③，而莎士比亞的同庚則可以和整整一群卓絕戏剧作家同时生活^④。

早就有人說過，凡是有便於杰出人物發揮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这就是說，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領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既然如此，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杰出人物，正如我們所說过的，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們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沒有这种趋势，他們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門檻。

① 波羅尼學派是意大利著名的繪画派別之一，在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之間有过极大的影响，是西歐學院派艺术的鼻祖。——校者注

②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 Paris 1892, pp. 24—25. [《意大利繪画史》，1892年巴黎版，第24—25頁。]

③ 1608年誕生的有特爾保、布洛威爾和伦勃朗；1610年誕生的有万-奧斯塔德、波特、波尔；1613年誕生的有万-德尔-赫斯特、道伍；1615年誕生的有梅茨；1620年誕生的有沃弗曼；1621年誕生的有維尼克斯、埃威尔定根和拜納克尔；1624年誕生的有伯尔格姆；1625年誕生的有波特尔；1626年誕生的有杨·斯騰；1630年誕生的有留斯德尔；1637年誕生的有万-德尔-海登；1638年誕生的有霍別馬；1639年誕生的有万-德-威尔得。35

④ “同时出現或相继出現的莎士比亞、彼蒙特、弗列特契爾、約翰遜、韦布斯特、麦辛泽尔、福特、密德尔頓和海武德等人便是一輩新起的人物，他們凭靠他們所处的那种方便的境遇而在前一輩人物所已預备好的土壤上繁盛滋長了起来”。泰納：«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1863, t. I, p. 468. [泰納：《英國文学史》，1863年巴黎版，第1卷，第468頁。]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杰出人物。泰納說得对：“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①。若是拉斐尔、米开兰基罗和达·芬奇在童年时期就被一些与意大利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一般进程沒有关系的机械原因或生理原因杀死了，意大利的艺术也許会沒有那样完备，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的一般趋势仍旧会是那样的。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兰基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們自己不过是这种趋势的优秀代表而已。固然，在一个天才人物周围通常有整个学派出现，并且他那些門徒对他的一切方法，甚至細微末节，也总是尽力摄取，因此，拉斐尔、米开兰基罗和达·芬奇如果不幸早年去世，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由此所遭到的損失便会对后来发展史中許多次要特点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只要当时意大利精神发展的一般进程中沒有某种一般原因引起的重大变化，那末这段艺术发展史实质上也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不过，大家知道，量的差別归根到底是会轉化为质的差别的。既然到处都是如此，历史上的情形当然也不例外。某一艺术潮流中如果有好几个能够成为它的代表者

^① 泰納：《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Paris 1863, t. II. p. 5. [泰納：《英国文学史》，1863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5 頁。]

的杰出人物都因各种不利情况的凑合而相继早死了，那末这一潮流也許始終不会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但这种人物的早死，只有在此潮流不很深邃，以致还不能提出一些新的杰出人物的情况下，才会妨碍这个潮流在艺术上有表现。可是，文学和艺术中任何一个潮流的深度都要依它对于自身所代表其趣味的那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以及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如何来决定，所以这里的情形归根到底也是要依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为轉移的。

八

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終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轉移的人們在生产的社会經濟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个人的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十八世紀的人們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他們把历史归因于历史人物的自觉行动和“情欲”。当时哲学家认为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因受某些极細微原因的影响而完全变更其方向，譬如說，由于某个統治人物的脑子里有某个“原子”作怪(这是《Système de la nature》[《自然体系》]一书里屡次表示过的一种意见)³⁶。

历史学中新学派的拥护者认为无论有怎样的“原子”，历史始终只能循着它实际经过的那条路綫进展。他們竭力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却把历史人物个人特点的意义完全忽略过去了。照他們那样說来，历史事变彷彿絲毫也不会因能力大小不一的人物的交替而有所变更^①。我們一旦认可这样的假定，就必然要承认个人成分在历史上根本沒有什麼意義，而把历史上的所有一切都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都归因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这是走极端，根本没有为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一部分真理留下余地³⁷。正因为如此，所以相反的观点才仍然保留有某种存在的权利。这两种观点間的冲突具有二律背反的形式：第一个命題是一般规律，第二个命題是个人的活动。从第二个命題来看，历史不过是种种偶然现象的凑合；从第一个命題来看，却会觉得甚至历史事变的个别特点都是由一般原因的作用来决定。如果事变的个别特点都是由一般原因的作用所决定而与历史人物的个别特性无关，那就不免要得出結論說，这些特点是由一般原因决定的，并且絲毫不會因历史人物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于是这种理論就带有宿命論的性质了。

反对这种理論的人們当然不会放过它的这种弱点。

① 即是說，像他們那样推論历史事变规律性，就会要得出这样一种結論来。而他們中間有些人在简单記述这种现象的时候，却甚至往往过分估計了个人成分的作用。但我們现在感觉兴趣的不是他們所作的記述，而是他們所作的推論。

聖博甫把米涅的历史观点同博胥埃的历史观点作了比較。博胥埃认为历史事变賴以发生的力量是从天上来，历史事变就是上帝意旨的表现。米涅在人类的情欲中寻求这种力量，这种情欲在历史事变中間像自然界的力量那样不可遏止地、一往直前地表现出来。但他們两人都把历史看作是一些絕對必然如此发生的现象所构成的一串連环；他們两人都是宿命論者；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实在是与牧师相近(*le philosophe se rapproche du prêtre*)。

当社会现象规律性的学說还根本否认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个别特点能对事变发生任何影响时，这种責难就始終是有相当理由的。而且这种責难本来应当引起更强烈的印象，因为新学派中的历史学家也如十八世紀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最高主宰，所有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都从它发生并且是服从于它的。既然法国革命已經表明历史事变不只是由人的自觉行为来决定，于是米涅、基佐以及属于該派的其他学者就把往往不受意識所支配的情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既然說情欲是历史事变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那末聖博甫說，如果当时有一些人物能在法国人民中間激起一种与当时激动法国人民的情欲相反的情欲，法国革命就会有其与我們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这又为什么不对呢？米涅也許會說：因为由于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属性本身，当时沒有其他情欲能激动法国人民。这种說法含有一部分真理。但这

一部分真理帶有很鮮明的宿命論色彩，因为它无异是說人类历史所有一切詳情細节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預先决定的。在这里，宿命論就会是專門注重一般而抹煞个别的結果。其实，它經常都是这样抹煞的結果。有人說道：“既然一切社会現象都是必然的，那末我們的活動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了”。这是对于一种正确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本来應該說：如果一切东西都是由于一般的东西而造成的，那末个别的东西——也包括我个人的努力在內——就根本沒有什么作用了。这样的結論本来是正确的，只是一般人把它运用得不正确罢了。用这种結論来評判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毫无意义，因为这个历史观对于个体的作用也是承认的。但用这种結論去評判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却是有根据的。

现在已經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的終极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说人的本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它常有变化，那它的这种变化本身显然又是由历史运动来决定的。现在應該承认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終极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历次变迁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除这种一般原因外，发生作用的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即某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賴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但这种历史环境本身归根到底又是由其他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造成的。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之外，还要加上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因为有这些个别原因的作用，才使事变具有其个别的外貌。个别原因并不能根本改变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而且个别原因发生影响的范围和方向是受这种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制约的。虽然如此，但如果影响历史的那些个别原因被另外一些个别原因所替代，那末历史无疑会具有另一种外貌。

莫諾和兰普勒赫特两人至今还是以人的本性为立脚点。兰普勒赫特坚决地并且不止一次地声言，他认为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正因为有这样一个错误，所以那种力求考虑“全部社会生活总和”的本来值得嘉奖的志愿，也就只能得出一种外表虽然美观，但内容却完全空虚的折衷主义结论，或是在那些推论得最彻底的人们那里得出像卡勃利茨的那种妄谈理性和感觉孰重孰轻的议論。

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①中，把伟人称

① 普列汉诺夫所指的系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s»)(1840)一书。——校者注

呼为創始人 (Beginners)。这是极其适当的名称。伟大人物确实是創始人，因为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別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滿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責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說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說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但这是一种莫大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力量。

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是怎么一回事呢？

俾斯麦曾說，我們不能創造历史，而應該等待它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誰造成的呢？它是由社会的人造成的，社会的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的人自己造成自己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但社会的人在某一时期造成某种关系而不是造成別种关系，这当然不是沒有原因的，而是受生产力状况制約的。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經不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状况的或者还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說，他确实不能創造历史，所以他在这场移动他的表針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既不能把時間加速，也不能使時間倒退。这里兰普勒赫特說得完全正确：俾斯麦在他权势最高的时候也不能把德国倒轉到自然經濟时代去的。

社会关系有它自己的邏輯：当人們还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們的感觉、思想和行为也就一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个社会活动家要想反对这种邏輯，也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就是社会关系的这种邏輯)定会把他的一切努力化为烏有的。然而，如果我知道社会关系因生产的社會經濟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而朝着什么方向变更，我也就会知道社会心理将朝着什么方向变更；因此我就有可能影响这种心理了。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說，我毕竟能够創造历史，因此我也就不必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

莫諾认为，历史上真正重大的事变和人物之所以重大，只在于两者都是社会制度和經濟条件发展的符号和象征。这一意见頗为公允，显然表述得很不确切；但正因为这种意见公允，所以决不可把伟大人物的活动同这种条件和制度的“緩慢变动”对立起来。“經濟条件”較为緩慢的变更过程，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必然要較为迅速地改造自己的制度。这种改造从来不是“自行”发生，而是始終需要人們来干預的，因此人們担负有伟大的社会任务。所謂伟大人物，也就是最能帮助解决这种任务的人物。解决任务，当然不能只算是任务解决的“象征”和“符号”。

我們觉得，莫諾之所以竟把两者对立起来，主要是因

为他被“緩慢”这一惬意的字眼迷住了。这个字眼是很多现代进化論者所爱用的字眼。这种偏頗态度在心理上很容易理解：它是必然要在那些崇尚中庸、稳健……的善良的人們中間产生的。但它在邏輯上根本不值一駁，黑格爾早就指出这点了。

并且不仅仅是那些“創始人”，不仅仅是那些“伟大”人物才有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场所。凡是愿用眼睛来看，愿用耳朵来听，愿拿一颗誠摯的心来爱护亲近人的人，都拥有这种场所。“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从道义方面說，每一个如聖經上所說愿意“为朋友舍命”^①的人都是伟大的。

① 語出《新約》《約翰福音》第十五章。——校者注

注 釋

1 普列汉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這一著作最初發表在《科學評論》雜志 1898 年第 3 期和第 4 期上，後來轉載於 1905、1906 和 1908 年出版了三版的《二十年間》文集上，並收入《普列漢諾夫全集》第 8 卷中。

本版是以 1941 年刊本為基礎的；這個刊本根據完整保存下來的手稿以及《科學評論》雜志和《二十年間》文集第一版做了校勘，而根據文稿中保存下來的信件看，《二十年間》第一版的校樣是曾經送給普列漢諾夫看過的。在根據手稿校勘時，除了寫法出入很大的地方外，還發現了許多人名和年月日的大錯誤，這些錯誤都是在所有生前和死后出版的版本中重複出現的。這些錯誤都在根據各種不同資料做了仔細核對後改正了；並且恢復了普列漢諾夫本人原來的文字。——第 1 頁。

- 2 卡勃利茨的這篇文章，於 1878 年在文藝政治報《星期周報》第 6、7 兩期合刊上發表。1882 年編進了卡勃利茨的主要著作《社會學概論。民粹主義原理》。——第 1 頁。
- 3 “可敬的社會學家”——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而言。在卡勃利茨的文章發表後，米海洛夫斯基立即在自己的《1878 年文學評論》中加以反駁（參閱《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 4 卷，1897 年聖彼得堡版，第 539—546 頁）。——第 1 頁。
- 4 “無為主義”——一種神秘主義的學說，出現於十七世紀末葉，它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由神的意志所決定，因此宣傳一種宿命論的觀點，說人應當漠不关心地、神秘靜觀式地對待生活，對一切持消極態度，“對災禍持無抵抗主義態度”等

等。——第 2 頁。

- 5 普利斯特列同普萊士进行的爭論，詳見普利斯特列的一部著作，其標題是：《普萊士博士与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关于唯物主义學說和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討論，对于这些通信，普利斯特列博士补充了一篇說明辯論本质的緒言，并且补充了几封致某些参加过这次关于物质和精神問題的討論的作家們的書信》，1778 年伦敦版。——第 2 頁。
- 6 Necessarians [必然主义者] 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它否定意志的自由，而认定精神的实体不是自由地起作用而是本着必然性起作用的。——第 3 頁。
- 7 清教徒——指的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在英國和蘇格蘭拥护加爾文主义的那些人，他們在十七世紀准备和实现英國資产阶级革命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第 3 頁。
- 8 远地点是月亮同地球相距最远之点，近地点是月亮同地球相距最近之点。——第 6 頁。
- 9 俄国主观主义者、社会学主观方法論者拉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等人认为，在建立社会科学方面應該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对于历史必然性的理解，而是愿望、“理想”等等的标准。——第 7 頁。
- 10 普列汉諾夫这里暗示屠格涅夫写的短篇《西格罗县里的哈姆雷特》。——第 7 頁。
- 11 大师，俄国学生們——即馬克思和他的俄国信徒，这是为了逃避书刊检查，在合法出版物中使用的代号。——第 9 頁。
- 12 参閱《黑格尔全集》，第 5 卷，苏联社会經濟书籍出版社 1937 年版，第 693 頁（列宁在《黑格尔〈邏輯學〉一书摘要》中摘录了这句話，并加上了批注：“必然性变成自由时并没有消失”。见《列寧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71 頁。——校者注）。——第 9 頁。

- 13 博馬舍反对了古典悲剧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所描绘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王公贵族，并且主要是从古代生活套用剧情的。他要求的是描写寻常真实人物的现实主义剧本。梯叶里在《*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Lettre I, Paris 1856 [《关于法国历史問題书信集》第一信，1856 年巴黎版。——校者注] 中，評論那些命名为《法国历史》的作品时写道：“在这些浮华的記載中，少数特权人物完全占据了全部历史场面，全部人民群众都被御用宮裝掩蔽住了，因而使我們在这里找不到一个严肃的訓誨，对我们有益的教訓，也找不到跟我們相同的人物的命运通常使我們发生的兴趣和同情……”（第 13 頁）。这些言論和博馬舍的意见相呼应。——第 22 頁。
- 14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梯也尔和米涅开始研究法国资產阶级革命史。梯也尔写了多卷本《法国革命史》（1788—1799 年），从 1823 年至 1827 年出版。米涅在 1824 年发表了两卷《法国革命史》。这些著作是第一次根据资产阶级观点替革命辩护，是关于革命历史的最初著作，其中貫串了因果論思想。
- 在本篇各次版本中，梯也尔的姓名都沒有刊入，但在本篇手稿上是有这个姓名的。——第 23 頁。
- 15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沙多勃利昂所說的如下一段跟米海洛夫斯基的所謂“真理和正义”論相近的言論（俄譯如下）：“不，如果把道义的真理跟人的行为隔开，我們就沒有判断行为的标准；如果把道德的真理跟政治的真理割开，政治的真理就失去自己的基础，那时就沒有任何根据崇尚自由而排斥奴役，崇尚秩序而排斥无政府状态了。你們会說：有我的利益在！但是誰对你們說过，我的利益在于自由和秩序呢？”等等（《*Oeuvres complètes de Chateaubriand*》，Paris 1860, t. VII, p. 59 [《沙多勃利昂全集》，第 7 卷，1860 年巴黎版，第 59 頁]）。——第 23 頁。
- 16 在各次版本中都誤作梯叶里。本版已按手稿改正。——第 23 頁。
- 17 《Le Globe》（《地球仪》或《地球》）——一种杂志，1824 年在巴黎由比埃

尔·列魯創办。1830 年前是純粹帶哲学和文学性的杂志，1831 年轉归了圣西門派。1832 年停刊。——第 24 頁。

- 18 除部分按原稿改正过的 1941 年版本外，在各次版本中，总是把梯也尔誤作米涅。——第 24 頁。
- 19 奧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 年)，——是奧地利(得到英国、荷兰援助，后来也得到俄国援助)同普魯士、西班牙、法兰西以及其他几个德意志国家和意大利国家之間进行的战争。反对奧地利的各个国家，想把奧地利在查理六世死后所管轄的一部分領土夺去。由于这次战争的結果，奧地利把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让給了普魯士，并且失去了它在意大利的某些領土。——第 25 頁。
- 20 根据 1748 年締結的亚琛和約，法国不得不把自己在尼德兰所占領的地区让給敌方。——第 25 頁。
- 21 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普魯士、英国、葡萄牙三国同法国、奧地利、俄国、薩克森、瑞典进行的战争。引起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奧地利企图收回西里西亚（参见注 19），英、法两国彼此爭夺加拿大和印度境內的殖民地領土。——第 25 頁。
- 22 由于七年战争的結果，法国被英国从加拿大和印度境內排挤出去了。——第 26 頁。
- 23 腓特烈二世的崇拜者俄皇彼得三世登基后，立即停止战争，因而使普魯士能按照 1763 年締結的古別尔土斯堡和約保留了加里西亚。——第 27 頁。
- 24 这一处的另一种手稿是：“圣博甫所提出的这些反对意见，可算是至今所有提出来反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学說的意见中最中肯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是很俏皮的。應該承认，上述那个学說的拥护者們通常都迴避了、而不是分析了这些反对意见以及至今在杂志論文和学术著作中常常引用的类似意见”。——第 29 頁。

- 25 这里用来同希波战争中的无组织的波斯军队对比的，是法国元帅图伦和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二世阿道夫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作战的军队。——第29页。
- 26 在历来各次版本中，都是误作“madame du Haliffet”。这次按照手稿改为“madame du Hausset”，她是彭帕杜尔的侍女，留下有自己写的回忆录。——第31页。
- 27 1793年1月21日，是法王路易十六被执行死刑之日。——第37页。
- 28 热月的反动——法国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局面。这次政变推翻了小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把这个专政的领袖罗伯斯比尔推上断头台斩决了。
热月、花月、草月、穑月、雾月等等，是法国国民公会（Конвент）1793年秋天颁行的共和国年历的月份名称。——第37页。
- 29 1796年11月15—17日，拿破仑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阿尔科拉近旁同奥地利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这次战斗给了法国军队以精神上的优势，从这时起，拿破仑就引导自己的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1812年止，当时拿破仑把自己的军队埋葬在俄国的雪地中了。——第37页。
- 30 雾月18日（公历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实行政变的日子。这次政变结果推翻了督政府制度，成立了执政府，然后又建立了帝国。——第38页。
- 31 督政府——法国在热月9日后建立的政府，从1795年10月起到1799年11月止。——第38页。
- 32 在历来各次版本中，都误作“茹尔丹将军”。这次按照手稿改正。茹伯尔在纳威会战中阵亡，普列汉诺夫引证的布罗克那本书中所说的正是这个茹伯尔。——第38页。
- 33 推勒里——巴黎的王宫。在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个王宫曾被人民占领，国民公会曾在这里开会。后来，这个王宫又成了皇帝和国王的住所

了。——第 39 頁。

- 34 往下在手稿中有如下一段被刪去的文字：“誰知道有多少軍事天才人物因‘旧規矩’只让貴族担任高級軍職而終身湮沒无聞呢？誰知道我国农民[中間]有多少具备伟大科学才能和艺术才能的人物始終不能發揮自己的天資呢？”

往下一段文字的另一种手稿是：“早已有人說过：凡是真正需要才能人物的地方，总是有才能人物出现。这就是說，凡是存在有便利才能人物发扬条件的地方，那里就有才能人物出现。关于才能人物可以說，他們也如灾禍一样，簡直是成群結队的。試回想一下，在法国跟拿破仑一起出現了多少軍事才能人物；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出現了多少卓越的画家和雕塑家；在英国跟莎士比亚同时出現过多少杰出的戏剧作家。当然，这一切才能人物不都是同样伟大的……”。——第 41 頁。

- 35 关于这个脚注中提到的各个人物及其誕生年代（有些是不很确切）的資料，是普列汉諾夫从 Eugène Fromentin, *Les Maitres d'autrefois. Belgique—Hollande*, 9. éd., Paris 1896, p. 174 [弗罗曼丁：《古代比利时画家和荷兰画家》，1896 年巴黎第 9 版，第 174 頁]一书袭用的。錯誤的年代已經改正（校者按，这些年代还有些不确切之处，讀者可查本书所附人名索引，此处不逐一注明。），遺漏的地方已經按照原文补正。——第 43 頁。

- 36 《*Système de la nature*》（《自然体系》）——霍尔巴赫的主要著作。——第 45 頁。

- 37 这一处的另一种手稿是：“他們认为，历史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像实在发生的那样发生。基佐在自己的一本政論小冊子中指出，拿破仑只有在他還表現着法国社会需要的时候，才是强有力，而当他已不再表现这种需要的时候，那末只要一天的工夫（滑铁卢一战），就足使他的力量完全消灭了。这当然正确。但是，作为对十八世紀历史学派观点的反动而发生的新历史学派的这一正确观点及其他类似观点，表现成了一种极端观点，竟完全不容許相反的极端观点中所包含的一部分真理有存在的余地”。——第 46 頁。

人名索引

三 画

大卫 (David 約死于公元前 973)——
《旧約》中犹太国的第二代国王(公元前 1013?—973?)。见《旧約》《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起至《列王紀》上第二章,《列代志》上第十一章起至二十九章。《旧約》中的《詩篇》据说大多出于他之手。——第 7 頁。

大流士 (Darius I 約公元 前 558—486)——波斯国王,世称大流士大王,曾两度远征希腊,均失败,即历史上有名的希波战争。——第 29 頁。

万-奥斯塔德 (Ostade, Adriaen van 1610—1685)——荷兰风俗画家,受布洛威和伦勃朗影响。——第 43 頁。

万-德-威尔得 (Velde, van de Andrian 1636?—1672)——荷兰风景画家。威尔得一家有很多画家。——第 43 頁。

万-德尔-海登 (van der Hayden 1637—1712)——荷兰画家。——第 43 頁。

万-德尔-赫斯特 (Helst, Bartholomeus van der 1613—1670)——荷兰肖像画家。——第 43 頁。

四 画

韦布斯特 (Webster, John 1580?—1625?)——英国剧作家,与海武德

合作过剧本。——第 43 頁。

什塔姆列尔 (Stammler, R. 1856—1938)——德国法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第 5、6、7 頁。

巴斯噶 (Pascal, Blaise 1623—1662)——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观点摇摆于唯理论和怀疑论之間。——第 28 頁。

巴撒諾 (Bassano, Giacomo da 1510—1592)——意大利威尼斯画家,意大利最早的风俗画家之一。——第 42 頁。

五 画

加尔文 (Calvin, Jean 1509—1563)——法国宗教改革家。——第 4、7 頁。

弗列特契尔 (Fletcher, John 1579—1625)——英国剧作家,与彼蒙特合作写了约五十个喜剧和悲剧。——第 43 頁。

兰波 (Rambaud, Alfred Nicolas 1842—1905)——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 42 頁。

兰普勒赫特, 卡尔 (Lamprecht, Karl 1856—1915)——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 16、17、18、19、20、49、50 頁。

古斯达夫-阿道尔夫 (Gustaf-Adolf 1504—1632)——即古斯达夫二世,

瑞典国王(1611—1632),三十年战争时以杰出的将才闻名。——第29页。
皮莱恩(Pirenne, Henri 1862—1935)——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20页。
皮士格律 (Pichegru, Charles 1761—1804)——法国将军。——第42页。
圣西尔, 古维昂 (Saint-Cyr, Gouvion 1764—1830)——法国元帅。——第42页。
圣博甫 (Saint-Beuve, Charles Augustin 1804—1869)——法国文艺理论家和诗人。——第24、25、28、29、30、35、47页。
卡莱尔(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理论。——第49页。
卡勃利茨(Каблиц, И. И. 1848—1893)——俄国作家,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极右的代表人物之一。——第1、2、49页。
卡列也夫 (Карее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0—1931)——俄国自由主义史学家。——第14、15页。
布隆 (Brune, Guillaume Marie Anne 1763—1815) 法国元帅。——第42页。
布图林(Бутур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1694—1767)——七年战争时俄军统帅。——第27、32、33页。
布洛利(Broglie, Victor François 1718—1804)——法国将军, 七年战争时为法军将领之一。——第26页。
布洛威尔 (Brouwer, Adriaen 1606?—

1638)——法兰德风俗画家和风景画家, 其生卒年代或作1608—1640。——第43页。

六 画

伦勃朗 (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1606—1669)——著名的荷兰肖像画家, 荷兰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第43页。
西叶斯 (Sieyè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拿破仑实行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何谓第三等级?» («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一书的作者。——第38页。
齐美尔(Simmel, Georg 1858—1918)——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家。——第8页。
乔尔乔尼 (Giorgione da Castelfranco 1478—1511)——著名的意大利画家, 威尼斯学派的主要人物。——第42页。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Alexis 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反动政治家。——第20页。
伊丽莎白 (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1709—1762)——俄国女皇(1741—1761)。——第27页。
达乌 (Davout, Louis Nicolas 1770—1823)——法国将军, 拿破仑的部下。——第41页。
达·芬奇 (Vinci, Leonardo da 1452—1519)——著名的意大利艺术家, 与拉斐尔、米开兰基罗并称为意大利

文艺复兴三杰。——第 42、44 頁。

米涅(Mignet, F. A. M. 1796-1844)——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试图从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然而是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的。——

第 20、21、23、24、28、29、47 頁。

米拉波(Mirabeau, H. G. V. R. 1749—

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资产阶级上层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人物。——第 28、33、36 頁。

米諾斯(Minos)——是传说中的古代克里特岛的国王。——第 21 頁。

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家，与达·芬奇、拉斐尔齐名。按米开兰基罗逝世于 1564 年 2 月 18 日，普列汉诺夫误为 1563 年。——第 42、44 頁。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自由民粹派社会学家，政论家。——第 1、23 頁。

七 画

杜雷(Duruy, V., 1811—189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 42 頁。

牢敦(Laudon, Gideon Ernst von 1717—1790)——奥地利元帅，七年战争时为将领。——第 27 頁。

沃弗曼(Wouwerman, Philips 1619—1668)——荷兰画家，擅长风景画和战争、狩猎等场面。——第 43 頁。

伯尔格姆(Berchem, Nicolaes Pietersz

1620—1683)——荷兰风景画家。——

第 43 頁。

廷托勒特(Tintoretto, Jacopo Robusti 1518—1594)——意大利威尼斯学派的画家。——第 42 頁。

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杰出的德国音乐家。——第 41 頁。

贝尔纳多(Bernadotte, J. B. J. 1763—1844)——法国将军。——第 38、41 頁。

麦克唐纳(Macdonald, J. E. J. A. 1765—1840)——法国将军。——第 38、41 頁。

麦辛泽尔(Massinger, Philip 1583—1640)——英国剧作家，曾与弗列特契合写剧本。——第 43 頁。

别西尔(Bessières, Jean Baptiste 1766—1813)——法国元帅，拿破仑的部下。——第 42 頁。

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俄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7 頁。

克莱贝尔(Kléber, Jean Baptiste 1753—1800)——法国将军，拿破仑的部下。——第 42 頁。

克伦威尔(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政治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著名活动家，成立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者。——第 4 頁。

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 公元前 69—30)——为埃及托勒密(Ptolemy)

王国最后一个女皇(公元前51—30)。——第28頁。

苏尔特(Soult, Nicolas Jean de Dieu 1769—1851)——法国元帅,拿破仑的部下。——第42頁。

苏俾兹(Soubise, Charles de Rohan 1715—1787)——法国将军,参加七年战争,由于彭帕杜尔夫人之力,而升为元帅。——第26、30、31、32頁。

苏沃洛夫(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著名的俄国元帅。——第27、33頁。

沙多勃利昂(Chateaubriand, F. R. de 1768—1848)——法国作家、政論家,代表反动貴族思想。——第23、24頁。

八 画

舍維爾(Chevert, François de 1695—1769)——法国将军,曾参加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第42頁。

图伦(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1611—1675)——三十年战争时法国名将。——第29頁。

果戈理(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52)——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第14頁。

弥拉特(Murat, Joachim 1767?—1815)——法国元帅,曾助拿破仑实行政变,后为拿破仑之妹婿,曾任拿不列斯王(1808)。——第42頁。

彼蒙特(Beaumont, Francis 1584—1616)——英国剧作家。——第43頁。

奈,米歇尔(Ney, Michel 1769—1815)——

法国军人,拿破仑的部下,后为元帅。——第42頁。

孟德斯鳩(Montesquieu, C. L. de S. 1689—1755)——法国启蒙学者、社会学家。他曾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过程描写为不依帝王将相和个别政治家的意志和意图而转移的过程,把历史的规律性归因于自然条件,即气候和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第21頁。

阿恒荷尔茨(Archenholtz, Johann Wilhelm von 1741—1812)——德国历史学家。——第29頁。

罗曼諾(Romano, Giulio 1499—1546)——拉斐尔的学生,继拉斐尔之后为罗马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第42頁。

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 M. F. M. I. de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专政的革命政府首脑。——第28、36、37頁。

波尔(Bol, Ferdinand 1616—1680)——荷兰肖像画家及宗教画家,曾学画于伦勃朗。——第43頁。

波特(Both, Andreas 1609—1652)——荷兰人物画家,其弟扬(Jan 1618?—1652)为风景画家。——第43頁。

波特尔(Potter, Paul 1625—1654)——荷兰画家,以善画动物著名。——第43頁。

拉斐尔(Raffaello Santi 1483—1520)——著名的意大利艺术家,与达·芬奇、米开兰基罗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

三杰。——第 42、44 頁。

拉薩爾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資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第 18 頁。

拉甫罗夫 (Лавров, 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民粹派社会学家和政論家，反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者，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对他作了毁灭性的批判。——第 7 頁。

九 画

若里 (Joly, A. 1839—1925)——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第 17 頁。

柯列乔 (Correggio, Antonio Allegri da 1494—1534)——意大利艺术家，伦巴底学派的画家，曾受达·芬奇影响。——第 42 頁。

約翰遜 (Johnson, Ben 1573—1637)——英国剧作家。——第 43 頁。

拜納克尔 (Paynacker 生于 1621)——荷兰画家。——第 43 頁。

十 画

特尔保 (Terborch, Gerard 1617—1681)——荷兰风俗画家和肖像画家。——第 43 頁。

俾斯麦 (Bismarck, Schönhausen 1815—1898)——普魯士政治家，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被称为“鐵血宰相”。——第 17、18、19、50 頁。

拿破仑 (Bonaparte, Napoleon 1769—

1821)——即拿破仑第一，法国皇帝 (1804—1814, 1815)。——第 7、28、36、37、38、39、40、41 頁。

留斯德尔 (Ruysdael, Jacob van 1628?—1682)——荷兰画家，世界最大的风景画家之一。——第 43 頁。

埃威尔定根 (Everdingen, Allart van 1621—1675)——荷兰风景画家及雕刻家。——第 43 頁。

海德 (Herder, J. G. von 1744—1803)——德国哲学家和作家。——第 21 頁。

海武德 (Heywood, Thomas 1574—1641)——英国剧作家。——第 43 頁。

茹諾 (Junot, Andoche 1771—1813)——法国将军，拿破仑的部下。——第 42 頁。

茹尔丹 (Jourdan, Jean Baptiste 1762—1833)——法国元帅。——第 42 頁。

茹伯尔 (Joubert, B. C. 1769—1799)——法国将军。——第 38、42 頁。

馬布利 (Mably, Gabriel 1709—1785)——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帝王和杰出人物的活动是历史变迁的基本原因。——第 21、22 頁。

馬尔索 (Marceau, François Séverin 1769—1796)——法国軍人，后升为将军。——第 42 頁。

馬尔蒙 (Marmont, Auguste Frédéric Louis Viesse de 1774—1852)——拿破仑的部下，后为元帅。——第 41 頁。

馬森那 (Masséna, André 1758—1817)——法国元帅，拿破仑的部下。——第 42 頁。

馬丁，昂利 (Martin, Bon Louis Henri 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第 29 頁。

馬爾亞-特列莎 (Maria Theresa 1717—1780)——奥地利大公妃，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后。——第 26、27 頁。

泰納 (Taine, Hippolyte 1828—1893)——法国资產阶级文艺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第 43、44 頁。

十一画

基佐 (Guizot, F.P. G. 1787—1874)——法国资產阶级历史学家。——第 20、21、23、24、47 頁。

梅茨 (Metsu, Gabriel 1629?—1667)——荷兰风俗画家。——第 43 頁。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大剧作家和詩人。——第 43 頁。

密德尔頓 (Middleton, Thomas 1570?—1627)——英国剧作家，与韦布斯特合写过剧本。——第 43 頁。

勒奈 (Renée 1510—1575)——法王路易十二之女，費拉尔 (Ferrara) 公爵夫人。——第 7 頁。

勒非夫尔 (Lefebvre, François Joseph 1755—1820)——法国将军，后为元帅。——第 42 頁。

莫罗 (Moreau, Jean Victor 1763—1813)——法国将军。——第 38 頁。

莫諾 (Monod, Gabriel 1844—1922)——法国资產阶级历史学家，《历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1875) 的創办人。——第 19、20、49、51

頁。

朗松 (Lanson, G. 1857—1934)——法国资產阶级文学史家。——第 3 頁。
朗恩 (Lannes, Jean 1769—1809)——法國元帅，拿破仑的部下。——第 42 頁。

梯也尔 (Thiers, L. A. 1797—1877)——法國反动政客、历史学家，摧残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23、24 頁。

梯叶里 (Thierry, Augustin 1795—1856)——法国资產阶级历史学家。——第 20、22、23 頁。

十二画

費希特 (Fichte, I. H. 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观唯心主义者。——第 5 頁。

黑格尔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9、33、34、52 頁。

腓特烈 (Frederick II 1712—1786)——即腓特烈二世，世称为腓特烈大王，普魯士国王 (1740—1786)。——第 27、33 頁。

提提安 (Titian, Tiziano Vecelli 1477—1576)——意大利杰出的画家，威尼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第 42 頁。

屠格涅夫 (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8—1883)——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7 頁。

彭帕杜尔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Jeanne-Antoinette Poisson Mar-

quisé de 1721—1764)——侯爵夫人,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妃。——第 26、27、30、31 頁。

博馬舍 (Beaumarchais, P. A. C.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 喜剧《费迦罗的婚姻》的作者。——第 22 頁。

博胥埃 (Bossuet, Jacques-Bénigne 1627—1704)——法国作家、主教, 天主教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思想家, 他从圣经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第 47 頁。

普莱士 (Price, Richard 1723—1791)——英国分离派宗教家、伦理学家及经济学家。——第 2 頁。

普利斯特列 (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著名的英国化学家、神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决定论者。——第 2、3 頁。

萊山得 (Lysander 紀元前 5 世紀)——斯巴达人的統帥。——第 22 頁。

萊布尼茨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第 6 頁。

萊喀古士 (Lycurgus)——传说为斯巴达的立法者。——第 21、22 頁。

斯腾, 杨 (Steen, Jan 1626—1679)——荷兰风俗画家。——第 43 頁。

斯宾塞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反动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是社会学中所謂“社会有机論”的創始人之一。——第 1 頁。

斯湯达尔 (Stendhal)——是安利·馬

利·倍尔 (Marie Henri Beyle 1783—1842)的笔名, 法国作家, 批判的现实主义者, 著有《红与黑》等小說, 写过拿破仑的传記。——第 42 頁。

十三画

道伍 (Dou, Gerard 1613—1675)——荷兰画家, 曾从伦勃朗学画, 以风俗画著名。——第 43 頁。

福特 (Ford, John 1586?—1640?)——英国剧作家。——第 43 頁。

奥什洛 (Augereau, Pierre François Charles 1757—1816)——拿破仑的部下, 法国元帅。——第 42 頁。

路德 (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活动家。——第 4 頁。

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1830—1840 年为法国国王, 即为七月王政。1848 年二月革命后被推翻。——第 39 頁。

路易十二 (Louis XII 1462—1515)——法国国王 (1498—1515)。——第 7 頁。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 (1715—1774)。——第 25、26、29、30、31、42 頁。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 (1774—1793)。——第 42 頁。

十四画

維科 (Vico, G. B. 1668—1744)——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 21 頁。

維洛涅則 (Veronese, Paolo 1528—1558)——繼提提安及喬爾乔尼為威尼斯學派的主要畫家，以裝飾藝術著名。——第 42 頁。

維尼克斯 (Weenix, Jan Baptist 1621—1660)——荷蘭畫家，以風景畫及畫狩獵場面著稱。——第 43 頁。

十五画

黎塞留 (Richelieu, Louis François Armand de Vignerot du Plessis 1696—1788)——法國軍人和外交家。——第 26 頁。

德宰 (Desaix de Veygoux, Louis Charles Antoine 1768—1800)——法國將軍。——第 41 頁。

摩西 (Moses 約公元前 1400—1200)——希伯來預言家，立法家。——第 4 頁。

摩爾退 (Mortier, Edouard Adolphe Casimir Joseph 1768—1835)——法國元帥，拿破崙的部下，1834—1835 年時曾任總理大臣。——第 42 頁。

十六画

霍什 (Hoche, Louis Lazare 1768—1797)——法國軍人，後升為將軍。——第 42 頁。

霍別馬 (Hobbema, Meindert 1638—1709)——著名的荷蘭風景畫家，曾學畫於留斯德爾門下。——第 43 頁。

霍爾巴赫 (Holbach, Paul Henri Dietrich d' 1723—1789)——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第 45 頁。

穆罕默德 (Mohammed 570—632) 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第 3、7 頁。

十七画

薛西斯 (Xerxes I 約公元前 519—465)——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之子，繼父業第三度遠征希臘，仍以失敗告終。——第 29 頁。

薩托 (Sarto, Andrea del 1486—1531)——意大利佛羅倫薩畫家。——第 42 頁。

B512.54

5

统一书号：3002·12
定 价：0.40 元